



## 花朵之间

周华诚



每一个纸袋上都写着父本与母本的编号,像是它们的爱情契约。

棉花地里的科研人员俯身于大地,他们是棉花的“红娘”,也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想要株型更好,就选株型理想的父本;想要纤维更长,就采长绒棉的花粉。一朵父本花,能授四五个母本。天气、阳光,甚至科研人员手掌握度和细微动作,都会影响花粉的散落。

每一个杂交组合,至少要做二十朵花。因为授粉有成功率,须留有余地。若遇上下雨,湿度大、温度不高,花粉存活率高,成功率也会提升——那是老天偶尔的馈赠。

赵晓雁最近一直在棉花地里。起早摸黑,地里的事是忙不完的。除了去雄、授粉之外,还要看花,看株型,看生长情况,每一株棉花都是长久凝视的硕果。对棉花的观察和记录是一年到头都要做的事。他是周曙霞的徒弟,也是农科所棉花研究室的主任,自2007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农科所工作,研究棉花。“棉花生长苗、花、蕾、铃、絮各个周期不等人,必须第一时间获得准确的研究数据,有的性状一旦错过,一年的生长周期就错过了,以后也不一定会重现。”

赵晓雁和同事们的工作日程,是和棉花的生长周期同步的:二月洗种,三月整地,四月播种,五月蓄期,六月花见,七月花铃,八月吐絮,九月取样,十月考种,十一月、十二月做纤维测定,一月案头研究,为新一年播种做准备……周而复始,与棉同息,一年到头几乎没有闲时。

棉花的花朵,从六月二十日左右开始见花,一路开到八月。一枝花谢,一枝又开,轮番登场,如同大地上的接力。而优良基因的相遇,却如大海捞针。一个一个配对,从理论上说,会有无数个组合。同样的一个组合,为了取得观察的准确度,要做几十个棉铃。等到棉花吐絮成熟,再对棉花采样、测量、记录。一个组合一个组合地试,一代一代地选,七八代之后性状才能稳定,再经过四轮评比,最后送审、评定——在这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无比耐心。一个棉花品种,从组配到审定,再到推广,要十年、十五年,甚至更久。

吴博、王文涛、梁伟、蒲艳梅……我在棉花地里碰到这些年轻的科研人员,他们每天泡在地里。在每一株完成授粉的棉枝上,都挂着一块小标牌,上面写着一串代号,标明父本和母本,白色的薄纸袋子里,装着优良品种的秘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成百上千个日夜的凝视。

这是一场科研人员与大地和时间的漫长对话,须有强大的耐心,和土地一样深的情意。

世界棉花看中国,中国棉花看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农业科学研究所于1960年2月成立,历经60多年的发展,风雨兼程。科研人员驻守在“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缘,在“无缰的野马”塔里木河畔,在万古戈壁荒原上,陈顺理等一代代棉花科研工作者,前赴后继,克服自然与技术的双重挑战,逐步攻克了沙漠化、盐碱化土地的育种难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育种奇迹。

1953年初,农一师通过农业部,从苏联引进埃及长绒棉品种“莱特福金”的种子500克,由陈顺理主持,在沙井子农业试验场试种两年,获得成功。此后,陈顺理从上千万株棉苗中找到“天然杂交变异株”,又经过3年多的育种和优选,终于培育出我国第一代早熟、丰产、长绒棉品种“胜利一号”,打破了“南疆种不出长绒棉”的魔咒,为新疆长绒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陈顺理被誉为“中国长绒棉之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成为全国最大的长绒棉生产基地。

此后,李尔文、杨亚东、周曙霞、邹忠、练文明……一代代棉花科研工作者就像接力一样,在这广袤的棉花地里洒下汗水,留下脚印,书写下他们平凡而伟大的科研人生。周曙霞、练文明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其他各种全国性的科研成果、荣誉奖项更是不胜枚举。

阳光下,赵晓雁的衣衫被汗水浸湿又被烈日烘干。穿行在棉株之间,他的手臂、面颊也时不时被划出一道道印记。“我的实验室就在地里。”他管着122亩棉花地,3000多份品种材料,有陆地棉,也有长绒棉。

赵晓雁说,“每个科研人员,都想要做出美好的东西”。日复一日下地,就像农民一样,这个过程既辛苦又幸福,“因为下了地,你的眼里只有棉花。越看,心里越静。科研工作很纯粹,很简单,所以也很幸福”。

授粉的间隙,赵晓雁伸直身体,用拳捶打腰部,棉花地里正好有风吹过。手掌中,一枝鹅黄色的长绒棉花在风中微微颤动,花瓣纤薄如翅,“像不像一只休息的蝴蝶?”

在新疆,棉花不只是花,更是云朵,是生计,是千年丝绸之路上的白银。到今天,新疆棉已是全球公认的高品质天然纤维,惠及全世界。

耕耘在棉花丛中的一代代科研人员,如胡杨一般沉默站立,深深扎根。他们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秋天到来时每一朵洁白的棉絮,都是他们的奖状;大地上的丰收,正是对他们最美的褒扬。

198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跟随胡如雷先生到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不久,胡先生建议我把博士学位读下来,并建议我报考南开大学杨志玖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次年春天的一天,胡先生对我说,准备一下,去天津见杨志玖先生。记得那天到天津时已是下午,我们下车后直奔南开大学北村杨先生家。落座后,胡先生把我介绍给杨先生,我的基本情况他早就在给杨先生的信中提及,只记得胡先生对杨先生说:“我就把李燕捷交给您了。”

现在的年轻学子可能会认为我们那时候上研究生很简单,有人推荐,跟导师见个面就成了。事儿可不是那么简单。首先,被推荐人得具备一定的学术造诣,或具备不错的学术潜质。其次,推荐人和接收人对被推荐人的学术造诣或学术潜质的肯定要达成共识;当然,推荐人和接收人都必须是本学术领域的权威人物:杨先生是当年隋唐史学界排名第一的史学家,胡先生是比杨先生年轻一辈的隋唐史学界重量级学者、中国唐史学会会长。还有一点特别重要,读研究生需要通过考试,除了专业课,还有通史、古汉语、外语等好几门考试,都是有及格线的,考不及格,导师也无能为力。胡先生颇具仪式感地把我交给杨先生,是相信我能通过考试。

那天,我边听两位先生交谈,边打量杨先生的书房。书房不大,房门在房间左边,进门右手边是一张床,左侧是一组单人沙发。窗下摆放着一张大书桌,杨先生坐在书桌前。书桌座椅后自外墙至床边,是一排书橱,书橱前斜放着一张藤椅,胡先生就坐在藤椅上。

书房,最核心的物件自然是书。杨先生的书房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书橱里的书,而是大量从书橱中“溢出”的书。大书桌上堆着高高的摞紧挨着的书刊,坐在书桌前的杨先生被前后书的“城堡”所包围,以至来客不是坐在书桌对面,而是坐在书桌侧面的藤椅上与之交谈。一个高几以及供先生休息的床上,也堆放着大量书刊。这些“溢出”书橱的书刊,看似杂乱却非无章,它们与书橱里的书一样,每一本的位置都是精确锁定的,而且,“溢出”书橱的书,或是需要经常查阅的,或是新近收到的。杨先生的书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更让我对他平添了一份亲近感。

杨先生说他视力不好,晚上不出门,晚饭由张国刚代表他为我们接风。那天晚上,国刚师兄请胡先生和我在一家淮扬菜饭庄吃饭,其中一道菜干烧鲳鱼颠覆了我的认知,那条鲳鱼个头足有一尺半左右,又宽又厚,“躺”在一个大长碟子里。这道菜唤醒了我的天津“基因”,发誓回去之后一定努力备考,考回天津,考到杨先生身边来读书。回到石家庄后,我开始集中时间和精力备考,不久如愿以偿来到南开读博土。

记得读本科时上中国通史课,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是胡如雷先生教授的。两个断代开始讲时,胡先生先要推荐几本参考书,介绍一下当时的前沿动态和最有资望的权威学者。魏晋南北朝史,胡先生介绍了四位学者——唐长孺、周一良、王仲荦、何兹全;隋唐五代史,胡先生介绍了两位大家,即杨志玖和韩国磐。跟随杨先生读博后,我得以开阔视野,接触到一流的学术大家和他们的学问。从本科到博士阶段,暗自立志学术研究并锚定研究方向后,我就有了这七位(加上胡先生)可仰望的学术大家,或入籍丁下,或亲聆教诲,或在大课堂聆听讲座……这成为我学术生涯致力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1991年春夏之际,在杨先生的指导下,我着手准备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答辩之前,先要完成同行评议,这是杨先生要亲自联系并委托中国唐史学界著名教授们去做的一件事。待陆续收到厦门大学韩国磐教授、郑学檬教授,北京大学吴宗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泽贤研究员、宋家钰研究员,复旦大学徐连达教授的评议意见后,杨先生又要邀请中国古代史学界人口及统计学领域的著名教授来主持、参加我的毕业论文答辩。一天,杨先生交给我写着地址的两封信件,要我去北京请周一良与何兹全两位先生来主持答辩。这次赴京的经历有遗憾也有满足,因周一良先生已有别的安排,无法前来天津参加我的毕业论文答辩,对我来说甚是遗憾;幸好何兹全先生答应前来主持答辩,他还问了我一些学习方面的情况,给我不少鼓励。

在杨先生身边读书的日子,总能从点滴之处感受到先生对学生的爱护之心。读博几年,虽不记得有念错字的经历,写错字倒是着实有。在学期间,我会定时向杨先生上交读书报告,读书过程中将笔记整理成文章,也会请先生审阅定夺。幸运的是,呈请审阅的所有文字,包括后来的毕业论文,均获杨先生首肯,驳回重写的一例也没有。尽管没有驳回,但是杨先生看得非常仔细,几乎每篇文字都有批改,而且批改内容甚至有对汉字书写不规范的改正。一般情况下,杨先生对批改内容不作讲解,让我回去自己看,有需要讨论之处下次再说。但在交了几次作业后,有一天,杨先生指着我的一篇文稿中他的批改处,非常正式又不失和蔼地对我说:“重要的重这个字,你不会写。”我一愣。杨先生接着说:“重这个字,最下面的这一横,一定要是这个字当中笔画最长的一笔,不然就无法承受重量,就会不稳,就会是功败垂成的垂的效果。”

这哪里是著名教授在指导博士研究生,分明是语文老师在教小学生写生字。

杨先生指出不止一处,我写的重字,最下面的一横确实不是最长的一笔,有时甚至比上面的一横还要短。白纸黑字,重这个字我真的不会写。记不清上小学时我是怎么写的,现在怎么把重字写成这个鬼样子呢!重是高频常用字,想来杨先生早就发现我不会写这个字,第一次批改作业时可能是皱皱眉头,放过去了;第二次又来,杨先生的眉头可能皱得更紧了,但是,忍了;接下来可能是从一忍再忍,到忍无可忍,最后告诉我,这个字你不会写。

杨先生是学术大家,为人却极为和善,对学生的态度用四个字形容就是和蔼可亲。王晓欣师兄曾用“好老头”三个字评价杨先生,我感同身受。杨先生指出这个字你不会写,算是用词严厉的批评了。这件事暴露了我的语文基础不扎实。如果是其他人,哪怕是系里的其他老师用这句话指出我的问题,我都会脸红,都会自惭形秽。而面对杨先生的批评,我虽然嘴里说着“对不起杨先生,这个字我一直写错,谢谢您的指教”,但却没有无地自容之感,反而是笑着说这些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杨先生看来,只有关心学生的老师才会说这个字你不会写,告诉你怎么写,别再到处去给我丢人现眼;对我而言,在那一刻,不管是尴尬地笑还是嬉皮笑脸,只有在亲近的人面前才能笑得出来——杨先生就是我们这些学生的亲人。

后来我从事文字编辑工作,曾多次与同事及作者讲过这段令我刻骨铭心往事。告诫自己也提醒他人,文字,要念得准确,写得规范,这是对所有文字工作者最基本的要求,杨先生当年就是这样教导我的。

想念杨先生,以此文纪念杨先生。

李燕捷



杨志玖先生晚年留影



“跃水飞鱼”进步桥(水彩画) 叶武文并图

我的这幅水彩作品,以仰视构图在画面中聚焦海河上的进步桥,既凸显了其组合钢结构的工业质感,也传达出其“飞驰列车”“跃水飞鱼”的双重意象。进步桥是一座自锚式桁吊组合钢结构桥,采用全焊工艺,共有33节钢箱梁,桥梁总长180米,全桥宽度30.7米,2007年10月建成通车。

第五四一期

# 满庭芳

## 妙笔纵横说天津

——评《天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刘焱

第一板块通过城市历史沿革及文化价值与特色两个小节,让读者快速了解天津的概况,天津这么大气而又动听的名字,至今已纵横了621年,追昔抚今,历数百年来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这座城市更是稳步长足向前,成为渤海湾的一颗明珠。《天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本书,再一次为天津送上生日祝福。

本书由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纂,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整体图片丰富,文字精练,内容安排上更是条理清晰且深入浅出,利用“别具一格”的名城价值与特色,筚路蓝缕的名城保护发展历程、津沽瑰宝的名城文化资源、蝶变新生的名城保护更新实践”四个板块,将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由来与发展、保护与更新,立体呈现给读者。

以吉鸿昌旧居、中共华北联络局旧址、中山公园、女星社旧址、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旧址等为代表的151处重要旧址、遗址、纪念设施或者场所类红色资源;以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戏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等为代表的国家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针对这七个类别,分别从资源总述、典型资源的历史沿革、资源概况、价值特色以及保护利用概况等诸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第四板块是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更新实践的总结和梳理。从2002年海河两岸综合开发改造项目开始,包含了道路改造、街区更新、村镇保护与景观营造以及设施修缮等多种类型项目,如大家熟悉的“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始于2012年;“大意风区”焕新计划始于2022年;解放北路历史街道保护与整修是2008年开始的,持续到2016年;第一机床厂城市更新项目是2023年开始的;还有广东会馆和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机厂房的修缮工程等,共梳理了17个项目。每个项目内容都包含了基本概况、规划策略、主要成效以及经验总结。从不同的项目中可以看到名城保护更新的理念、方法、形式都在与时俱进,更新改造后的成效更是有目共睹,很多地方都成了天津这座城市新的地理坐标,成为市民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和旅游者必到的打卡地。

合上书页,意犹未尽,这本书无疑是建筑、规划、历史领域学子的理想读本,是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宝贵资料,是文旅策划者的灵感源泉。然而,其价值远不止于此,它更是一把让所有关心天津的人,读懂这座城市空间演变的“钥匙”,它所描绘的这幅完整、立体的名城画卷,收藏了昨天,记录着今天,更昭示着明天,必将让每位读者更加了解、珍惜并热爱我们这座城市。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纯粹而复杂,清澈而纠结,不知牵动过多少读者的心;宝黛没有实现婚姻,又不知引发了世人多少慨叹。婚姻虽不是爱情必然和必要的结果,但在现有后四十回内容的影响下,世人不得不深思宝黛姻缘破灭的原因。

早年读《红楼梦》,知宝黛爱情的悲剧既缘于残酷的现实,又缘于超现实的宿命,也就不得不替他们认命,替他们惋惜。多年后读到启功先生的一篇文章,他提到从前习惯“中表不婚”,如果女孩嫁给了舅舅家的儿子或者男孩娶了姑姑家的女儿,“叫做‘骨肉还家’,更犯大忌。血缘太近的人结婚,‘其生不蕃’,这本是古代人从经验得来的结论,一直在民间流传着。本书的作者赋予书中的情节,又岂能例外!不管后四十回的作者是谁,我们也应该承认他处理得完全合乎当时的生活背景,而不是专为悲剧性质硬行安排的这种情节。读了这段话,我的直觉不是恍然大悟,而是“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原来,宝黛的婚姻本就不成立,相关争论也就失掉基础,一切纠葛真成了“枉自嗟呀”,所有惋惜也真成了“空劳牵挂”,能不让人感到荒诞吗?

启功先生对《红楼梦》深有研究,他出身满族,对相关礼法风俗等有多于常人的见识。对“中表不婚”,他曾多次强调,如在一次访谈中更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常识农村老太太都懂。宝黛不能结合就是这么简单的常识问题,哪有什么‘伟大的悲剧’?所以我说,对《红楼梦》绝对不要神化,用一颗平常心去研究就行了。”(徐可《三读启功》)

得到了这个“常识”,很多人就像抓住了现实的钥匙,对宝黛不能结婚的悬案终于感到了踏实,也就轻松地不再多思多辩,就像有学者所说:“这个从民间习俗的角度对宝黛爱情悲剧的解释迥异于以往从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视角作出的解释,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切近真实的喜悦。”(邝海炎《快刀文章可下酒》)但我仍然无法接受就这样对书中的“悲剧”轻易放手。

很早就听过“姑舅亲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姨表亲不算亲,死了姨娘断了亲”的谣谚,至今未觉有甚深意;但在血缘关系极受重视的传统社会,这话简直是

法条式的口诀。可是,我们似乎很难看到《红楼梦》中人物以此去否定宝黛的爱情,即便谈不上大范围明显的赞成,但若严格执行“中表不婚”,像王熙凤那样曾用“吃了我们的茶,怎么不给我们家作媳妇”这样的话拿黛玉打趣,就大可不必了,又像紫鹃劝黛玉趁老太太身子硬朗、脑子明白,赶紧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定下来,也根本就不可能了。就宝黛自身而言,虽是“爱情的叛逆者”,但似乎看不出他们对“中表不婚”有针对性的叛逆。此外,许多年来《红楼梦》的读者,尤其是旧社会的读者,似乎很少用“中表不婚”否定宝黛婚姻的可能性,难道书里书外,这么多人都是忽略“常识”的“例外”吗?

对此,有学者指出,清代自雍正起逐渐推行“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曾入《大清律例》),“中表通婚”的事实的确大量存在,因而有人认为雪芹的时代“中表不婚”早已松弛。但又有学者指出满族习俗对“姑女不倒流”格外重视(这或许也是启功先生对此格外强调的原因),雪芹虽是汉族人,但出身包衣世家,他对“中表婚”仍宜审慎。又有学者指出,雪芹对满汉习俗常持矛盾态

度,像刻意不写女人的脚,其实体现对民族感受的纠结——凡此种种,总让我们觉得问题不会简单到一句话可定“常识”之有、“悲剧”之无。宝黛爱情的悲剧并非后四十回的独创,前八十回中早有铺陈,而悲剧背后的原理再简单,也无法掩盖其巨大的悲剧性。其悲剧的伟大意义,也不是简单地说一句他们本来就不被允许结婚就可以了结的。有学者推断,在雪芹原笔下,还没来得及谈婚论嫁,黛玉就已早逝,这并非不可能,因为她的命,断于“泪尽”,不必止于婚变。

书中人物并未对宝黛有可能走向婚姻大惊小怪,这是“内证”,雪芹也许本就对“中表通婚”持宽容态度;但假设雪芹本就像满族人一样持审慎的态度,却又把情节刻意写成这样,那么,其悲剧的构思恐怕就又多了更复杂深隐的内涵了。

### 红楼微语(二)

## 宝黛的“中表不婚”

魏暑临

